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IESR
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PR IESR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政策简报

政策研究中心

第四期

2018年4月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建议

牛梦琦 张思思

一、引言

“海港”和“城市”是湾区经济的两大主题。”“湾区经济”是指因拥有海湾的地理禀赋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高级区域经济形态（马忠新，2017），其一般由多核都市圈（或称城市群）组成。城市群中定有一个城市为核心都市，核心城市一般为政治、经济或者金融与文化中心，其他城市则围绕核心城市谋求产业与职能的错位发展，共同提升整个湾区经济的竞争力（张锐，2017）。何诚颖和张立超（2017）总结道，成熟的湾区经济需要具备的条件有：1）相应规模的超级体量；2）强大的产业集群带和一定的世界影响力；3）强有力的经济核心区和广阔的经济腹地；4）一大批科研教育机构、创新性国际化领军人才。

2017年3月5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设想覆盖了广东省9座城市：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江门、惠州、中山、肇庆，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测算表明，粤港澳大湾区2016年经济体量达到1.35万亿美元，当量位列世界经济体第12位。大湾区中深圳港、香港港和广州港三港2016年总吞吐量6,247万标箱，位居世界第一（何诚颖&张立超，2017）。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达活跃，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发展特征，已初步形成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综上，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建设成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

本文将分三部分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出谋划策。第一部分立足广州，从引进高端人才、吸引常住人口、提升产业结构、完善营商环境四个角度，阐述广州在大湾区背景之下的发展规划建议。第二部分立足国际，介绍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在湾区经济建设上的技术性细节，总结国际经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提供借鉴。最后，本文在结语部分总结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主要困难及发展展望。

二、发展规划建议

1. 引进高层次人才，完善配套制度

人力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广州若要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居于核心地位，必须在人才聚集上处于区域制高点。广州市的人才引进制度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目前，广州采用直接落户和积分落户两种形式。相比起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对于普通的本科毕业生或者是技能劳动者的政策非常开放，将户口视为一项基本公民福利，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¹。广州市目前的高端人才引进政策包括：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奖励制度、羊城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广州市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项目实施办法、广州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引进培养项目实施办法、广州市留学人员来穗工作资助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才绿卡制度。

¹ 参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黄埔大道西”推文《中国一线城市户籍鄙视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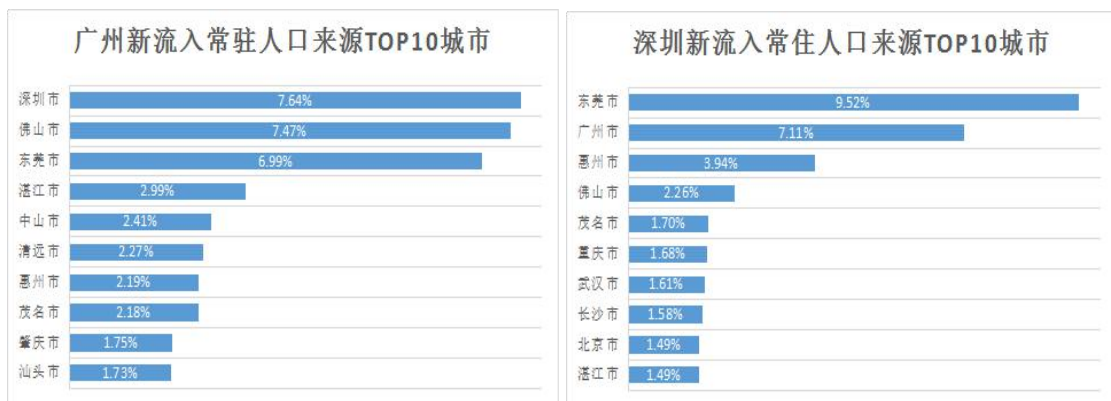
然而，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广州的发力远远不够，与同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深圳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1) 从时间上看，广州引进高端人才的体系于 2016 年建立，缺少政策施行经验。深圳市从 2011 年开始就探索一套较全面的针对不同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奖励体系，其中包括杰出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后备级人才等等。2) 从对象上看，广州市的人才政策主要针对特定行业，如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金融行业和医疗行业。而深圳市目标引进的高端人才既针对基础学科研究、科技创新、金融等方面，也面向教育、艺术、体育等其他产业。3) 从资助程度看，人才层次是深圳市资助的唯一标准，其中，杰出人才资助金额达到 600 万，后备级人才资助金额也达 160 万。相比之下，广州市主要资助杰出产业人才（补贴 500 万），对于高层次留学归国人员的补贴仅三年 10 万。事实上，留学回归人员在深圳即可被认定为后备级人才，他们在深圳和广州的资助待遇相差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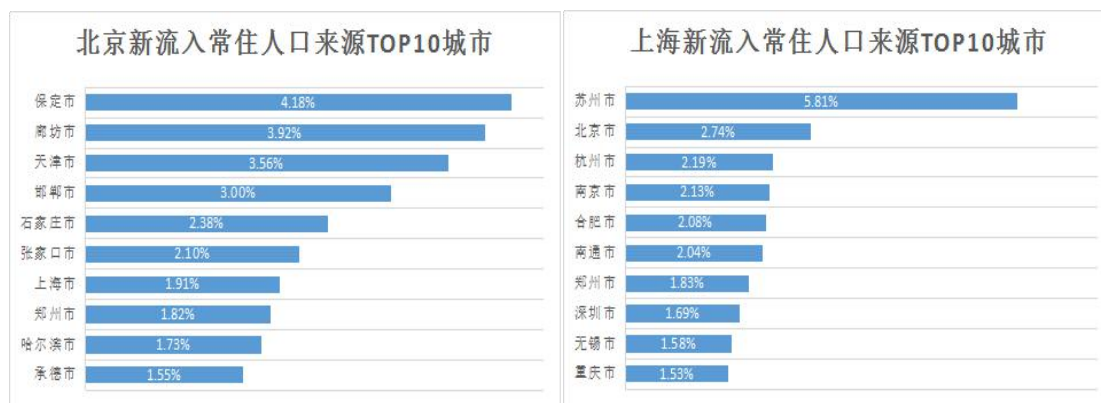
事实上，人才引进的全国大战愈演愈烈。过去的十年，虽然北京和上海都以落户难著称，但今年北京也开始调整人才策略。3 月 21 日，北京市政府网站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关于印发《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根据《管理办法》，北京市政府在户口问题上将不再一刀切，而是根据城市定位和产业导向，有针对性地撕开落户的口子，甚至直接用户籍吸引高端人口。比如，3 年累计获得 7000

万元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可申请落户；优秀的天使和创投基金高管可直接落户。此外，《管理办法》中提到，北京市将开通高层次国内人才引进“绿色通道”，为“千人”“万人”“海聚”“高创”“高聚”等国家和北京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的专家、重要科技奖项获奖人等，直接办理引进手续。随着顶尖一线城市加入人才竞争的行列，广州加快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刻不容缓。

2. 吸引常住人口，需要另辟蹊径

2017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449.84万人。2015-2017年，广州常住人口每年的增量分别为42.06万人、54.24万人、45.49万人。根据百度地图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广州新流入常住人口主要来源是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惠州、清远等省内广州周边城市，但深圳吸引了包括武汉、重庆、长沙等二线城市、甚至北京等省外地区的人口。相比之下，北京、上海两个一线城市吸引常住人口的辐射范围更广，囊括相邻的多个省份。





组图 1：“北上广深”常住人口来源情况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2017 年度中国城市研究报告》

对于城市发展来说，尽管高端人才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常住人口同样不可忽略。要可持续地吸引常住人口流入，广州市必须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多个方面。

1) 从就业方面来看，统一的基本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制度和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尚未建成。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供给模式较少，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发展不够，一些职工和企业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切实维护，区域间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的均等化、城乡间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一体化和各类劳动者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权利的公平化没有实现，没有形成全省各类劳动者比较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以及和谐的劳动关系。

2) 从住房保障来看，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和新就业无房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尚未解决，异地务工人员居住条件较差。

3) 从公共教育来看, 普惠性的学前教育体系尚未建成, 义务教育均衡化、高中阶段教育优质化、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化、高等教育普及化尚未实现。

4) 从医疗保障来看, 广州医疗保险制度不够完善, 仍存在因病致贫社会问题, 缺少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医保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基本医疗保险均等化没有实现。

针对这些问题, 广州应该从以下几点出发, 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 吸引常住人口。1) 增加租赁房屋供给的多样性。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贴, 全面支持城中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出租屋建设, 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降低租房成本。培育公寓产业, 发展品牌青年公寓和服务型公寓。此外, 还可依托互联网金融建立信息化平台, 创造新的住房租赁金融模式。在信贷、土地、税收等各方面对住房租赁企业给予政策倾斜, 培育和引进公寓管理专业人才和金融人才。2) 大力加强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投入, 进一步放开政策限制。广州的随迁子女数量庞大, 如果地方政府能出台相应政策对他们进行接纳, 他们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潜在因素和社会长期和谐的基础。长远来看, 教育才是最大的供给侧。目前北京上海都在“教育控人”, 广州应该抓住机会, 人弃我取, 人退我进, 接纳流动人口并投资教育事业。

3. 完善产业结构, 实现差异化发展

综合各大城市的经济现状, 广州、深圳和香港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领头羊。值得注意的是, 广州、深圳和香港都

有自身的特色产业。广州的龙头产业有国际商贸、汽车制造、移动互联网、地产业、电子显示业等；深圳在通信和互联网设备电子业、生物科学和互联网产业方面独占鳌头；香港的国际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闻名世界。大湾区三大巨头的发展各有特色和优势，但是主导产业有所重叠。依托大湾区平台，广州应该进一步明确如何提升产业结构、实现差异化发展。

3.1 物流产业

广州素来是商贸重镇，商贸经济和会展经济一直是全国龙头。然而，随着金融危机以来外贸规模的下降，以及义乌等城市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起新型商贸模式，广州商贸重镇的地位受到冲击。随着“互联网+商贸”模式的普及（线上、线下），物流将处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广州要成为国际航运枢纽和国际航空枢纽，则必须明确区位优势 and 差异，扩大辐射半径，增强城市影响力。从地理区位来看，广州濒临中国南海，与香港、澳门隔海相望，广、深港口起到连接内地广阔腹地的作用。香港是内地对外交通的门户，处于亚洲航运和国际贸易的中心位置，欧、非、南亚往来东亚之间的航运都以香港为必经之地。此外香港的金融、法制环境完善，使得国际物流货船更愿意选择在香港中转。深圳，作为紧邻香港特区的一线城市，其承接作用无可替代。

如表 1 所示，2017 年，广州港口全年集装箱吞吐量 2037 万标箱，位居全球第 7。与之相比，香港全年吞吐 2076 万

标箱，位居全球第 6；深圳全年吞吐 2521 万标箱，位居全球第 3。以往广州港口吞吐量少于深圳，因为佛山等地的企业出口货物经常通过深圳港运输。广州南沙港兴起后，佛山、中山等地的物流也开始转向南沙港。从表 1 可以看到，广州 2017 年吞吐量增速达到 9.6%，而深圳和香港增速分别仅有 4.6% 和 4.5%。随着南沙的建设，广州华南物流中心的位置正逐步显现。

表 1：2017 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TOP20

2017 年	2016 年	港口	2017 年 (万 TEU)	2016 年 (万 TEU)	增速
1	1	上海	4023	3713	8.4%
2	2	新加坡	3367	3090	9.0%
3	3	深圳	2521	2411	4.6%
4	4	宁波-舟山	2461	2157	14.1%
5	5	釜山	2140	1945	10.0%
6	6	香港	2076	1981	4.5%
7	7	广州	2037	1858	9.6%
8	8	青岛	1826	1801	1.4%
9	9	迪拜	1544	1477	4.5%
10	10	天津	1521	1450	4.9%
11	12	鹿特丹	1360	1239	9.8%
12	11	巴生	1206	1317	-8.4%
13	14	安特卫普	1045	1004	3.6%
14	16	厦门	1038	960	8.1%
15	13	高雄	1024	1046	-2.1%
16	15	大连	971	959	1.2%
17	18	洛杉矶	934	886	5.5%
18	17	汉堡	900	893	0.8%
19	19	丹戎帕拉帕	833	828	0.6%
20	20	林查班	776	723	7.3%

目前，南沙已经布局了铁水联运，南沙港铁路通过广珠铁路向北连接京广铁路，辐射中南地区；向西沟通贵广高铁、南广高铁、柳肇铁路等铁路线路，辐射西南地区；向东衔接广深铁路（广九铁路）等。铁路自新建的鹤山南站接轨引出，途经江门市鹤山、蓬江，佛山市顺德均安，中山市小榄、东风、南头、黄圃，广州市万顷沙站，终点至南沙港站，向南延伸至南沙港区南部车场。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贵州、广西中北部、湖南、粤北的货物，可以全程通过铁路到达南沙港出口。

商贸业是广州的传统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广州必须利用航运优势将商贸业转型为现代物流业和商贸服务业，加快南沙副中心的建设，并且利用南沙港的航运条件积极拓展与临近内陆省份和“一带一路”上国家的经济联系，将广州定位为服务于珠江口西岸、粤北、湖南、广西中北部、贵州的腹地货物的进出口海港。

3.2 金融业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催化剂甚至核心。纵观世界上的顶级城市，无一不是金融强市。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已成为华南金融中心。如何补足金融短板，是广州面临的一大问题。2016年广州金融业增加值只有上海的40%，深圳的66%，几乎要被天津和重庆超越。深圳有深交所；平安、招商、中信证券等几大券商、多家股份制银行、保险和风投基金机构都落户深圳。广州本土的券商和基金，除了广发证券、广州证券、易方达基金和广发基

金四家，其他乏善可陈。因此，广州如何在已有香港和深圳两大金融中心的情况下，实现准确定位并成功突围，事关广州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

从整个湾区来看，香港金融亮点是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深圳金融亮点是股份制银行、证券业和对接香港的人民币国际化后台，广州金融亮点将是央企国际化基金财务管理中心和全国私募股权交易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目前，在首都疏导功能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铁走出去基地已经落户南沙，国新央企基金投资运营中心和央企财务管理中心也将落户广州南沙。此外，央企金融板块、华电集团金融板块也将在广州设立。在全国私募股权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方面，中证报价南方运营中心即将在广州设立，并启动中证报价私募股权市场上线。该项目的落地，标志着两所(沪深交易所)、两系统(全国股转系统、中证报价系统)在京沪广深形成四足鼎立局面，广州也结束了缺乏全国性金融交易平台的历史。

另外，广州提出打造“风险投资之都”，将其作为助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之一。短短几年，全市各类的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机构从2010年100多家、市值不到300亿元，快速提升到2017年的3000多家、市值接近7000多亿元。一批知名投资机构快速发展，成为第五大支柱产业。未来广州还将持续发力，从市的层面出台各项扶持激励政策，覆盖创业投资各个环节。

从广州已有的金融项目规划来看，广州已逐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实现差异化发展，理清自身定位。但我们应认识到，广州目前尚处于学习和建设的阶段。只有坚定地引进金融专业人才，学习成功经验，才能加快项目推进和成功实施。

3.3 科技产业

在科创方面，深圳被称为华南硅谷，但深圳只在科技应用孵化方面突出，其科研能力和科教实力都比较薄弱。与此相比，广州可以发挥综合性一线城市的功能，凭借较低的房价、全国排名第三的教育医疗实力，吸引一批优秀的科技企业，打造国际创新枢纽。

广州目前在互联网、汽车制造和电子显示业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落户广州的互联网企业（部门）包括：网易总部、腾讯微信、阿里华南运营、思科中国创新总部、亚信全球总部、微软移动应用孵化中心、唯品会、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总部等。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虽然深圳在通讯设备和电脑手机制造远超过广州，但在平板显示行业，虽然深圳有华星光电，但随着 LG 两期 700 亿投资、富士康 610 亿首期投资落地广州，预计不久将来广州的产业规模将超过深圳。另外，在机器人产业方面，国际四大机器人集团都将在广州开发区设立生产基地，这也让广州在高科技产业竞争中增添不少优势。

4. 改革商事制度，提升营商环境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广州必须借鉴国内外先行地区的经验，采取新思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革。广州必须把改革重心从放宽市场准入改革，转移到以政府为改革对象的市场监管改革，把商事制度改革事业推向新阶段。

建议广州在省内率先推出包含银行开户许可和刻章许可在内的“多证合一”改革，缩短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时间。目前，国内部分省市以及省内部分地区已经整合了银行开户许可和刻章许可；国家也要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开展“多证合一”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多证合一”整合的证件数量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从本地企业的真实需求出发，真正压缩企业进入市场前后普遍涉及的证照事项。

其次，建议广州推进住所申报制改革，深化“简易注销改革”。前者是缩短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时间，后者是破解“退出难”问题，形成“易进+易退”的商事制度闭环，为企业退出市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再次，试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现审批与监管相分离，破解“准营难”问题。“先照后证”改革后，需要办理的相关许可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监管部门“以审代管”、“重审轻管”现象没有消除，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从商改前的“准入难”，转变为“准营难”。建议借鉴先行地区经验，试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倒逼市场监管部门集中精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宏观调控以及制定行业规划等，由微观事务的干预转变为宏观层面的管理，从根本上杜绝“以审代管”、“重审轻管”。

最后，为适应新时代新使命，试点“商事登记局+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的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为商事制度改革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建议根据商事活动全流程：进入市场、行政许可、市场监管、退出市场，落实十九大精神，重新归并商事职能部门权力，试点“商事登记局+行政审批局+市场监管局”的基层组织架构，商事登记局集中市场主体登记与注销、行政审批局集中行政审批权、市场监管局集中市场监管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三、国际经验的借鉴

世界上有三大知名湾区，纽约湾区靠港口贸易起家，旧金山湾区除了贸易还有科技创新，东京湾区则以制造业创新制胜。在工业化的主线下，各湾区在细节推动上各有特点，技术性细节对于湾区建设的成功有着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在本节将简要介绍世界三大知名湾区在技术性细节上特点，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总结国际经验。

1. 纽约湾区：建设 OTC（场外交易）市场

在金融体系非常发达的美国，存在一个多层次的复杂金融市场。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部分：第一，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为向大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的全国性市场；第二，美国证券交易所 (AMEX) 和纳斯达克小型资本市场构成了向中小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的全国性市场；第三，由波士顿股票交易所、芝加哥股票交易所、太平洋股票交易所等地方性股票交易所构成的区域性交易所市场；第四，由 OTCBB 板块、粉红单板块和灰色 OTC 股票市场构成的向广大中小企业

提供股权融资的 OTC 市场（蔡双立&张元萍，2008）。

与即将落户广州的中证报价系统类似的非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市场，美国有两类：OTC 市场、非标权益市场和私募市场。OTC 市场只是把券商柜台通过电子手段连接起来的报价系统，本身不从事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由分布各地的市商平台分别完成。在公告板市场和粉单市场上交易的股票无论从上市标准还是从信息披露程度上，都比上市公司的股票要差。OTC 市场在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具体体现在：1) 为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提供融资便利。2) 为风险投资提供了多层次的退出渠道。3) 为不能或者不愿意在主板市场上市的股份的转让提供渠道（蔡双立&张元萍，2008）。非标权益市场和私募市场，是以交易私募股权、限制性股权和非标准化股权的市场，以 Portal、SecondMarket、NYPPEX、SharesPost 等为代表。其中，私募股权的转让主要在以 Portal、NYPPEX 等为代表的场外市场上进行，而 SecondMarket、Sharespost 虽然也进行私募股权的转让，但是它们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交易限制性证券和一些非标准化股权产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有点类似我国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产权交易中心。广州可以深入学习这几大交易平台的搭建方式和运用模式，助力金融产业的发展。

2. 旧金山湾区：高科技创新驱动

旧金山湾的增长引擎是硅谷，尽管目前深圳更接近硅谷的定位，但是广州仍然需要努力推动产业创新，保持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硅谷的成功离不开先进的科技金融体系、宽

松的创业环境以及雄厚的科研实力。

首先，先进的科技金融体系对旧金山湾高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持。旧金山湾区是美国乃至世界风险投资行业最发达的地区，以风险投资行业为主体，以传统金融产业、创业板市场为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企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各个阶段，各类社会资源均得以充分调动和配置，以满足科技企业的资源需求（伍凤兰&陶一桃&申勇，2015）。

其次，宽松的创业环境促进了旧金山湾区的创新。旧金山湾区拥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小企业，它们富有创新精神，成为旧金山湾区经济发展源动力（伍凤兰&陶一桃&申勇，2015）。在硅谷，虽然很多企业的聘用合同上都规定了员工不得用公司的资源做自己的发明创造，但该条规定在执行上非常宽松。原来的公司甚至成为其员工新创公司的投资方。甲骨文、思科、英特尔、雅虎和谷歌等公司都是靠“前东家”的宽容才得以创立并且成功的。

最后，雄厚的科研实力是旧金山湾区持续发展的基础。旧金山湾区以知识技术为基础，拥有雄厚的科研力量和庞大的人才队伍。目前，旧金山湾区拥有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大学等 20 多所著名大学，还分布着航天、能源研究中心等高端技术研发机构，引领全球 20 多种产业潮流（张锐，2017）。

3. 东京湾区：统筹规划，错位发展

回顾东京湾区历史，可以发现：战后东京湾区经济发展形态演变可概括为 3 个阶段：1) “绿环带+新城”，由政府

集中规划，建立卫星城，保留部分绿地；2）“一极集中”：提出将东京作为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中枢；3）“多心多核”：在东京“一极集中”的基础上，在大东京都市圈划分多个核心城，最终达到大都市圈均衡有序发展的目标（张晓兰，2013）。

东京湾区的六大港口分工明确，依托庞大的港口群沿三个方向向日本腹地辐射，形成京滨、京叶和鹿岛三大工业带，并以东京都为核心，逐步向关东平原及其他内陆腹地延伸，形成庞大的湾区城市群。随着湾区城市群陆续兴建了大批连接湾区内部城市和对外交往的海陆空交通设施，如1997年横跨东京湾连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湾区内城市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马忠新，2017），经济效率不断提升。

通过对东京湾区的分析，可以看到，一方面产业集群的集约建设、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人口的集聚扩散，是东京湾区发展的内在经济机制；另一方面，政府统筹规划湾区内工业的空间布局，各核心城错位发展，促进了湾区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对东京湾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何诚颖&张立超，2017）。

4. 小结

在共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湾区在具体发展细节上各有特点，可供粤港澳大湾区借鉴，总结见下表：

	特点	借鉴
纽约湾区	私募交易市场	发展更加先进的金融产业，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

旧金山湾区	高科技创新驱动	学习硅谷科技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厚植科研实力
东京湾区	统筹规划，错位发展	围绕着核心城市谋求产业与职能的错位发展，提升整个湾区经济

从纽约湾区，广州可以深入学习 OTC 市场的搭建和运营模式，建设好南方运营中心，并发挥其“四板市场”的作用，扩大其金融辐射能力。良好的金融产业最终可以反过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从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鉴其高科技创新经验，尤其是力争成为“中国硅谷”的深圳，可以从创新制度的设计、创新文化的营造、创新实力的培育等方面，提升自身科研和科技产业实力。

从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借鉴良好的湾区城市群规划，实现错位发展，从整体层面提升整个城市群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香港、广州与深圳均应准确做好自身的优势定位，即香港突出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广州凸显贸易枢纽作用，深圳彰显科技创新角色，三地在错位竞争中互补与协调发展，从而打造出极具中国特色的湾区经济模式（张锐，2017）。

四、结语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的 GDP 总量已经位居各大湾区之首，但与世界其他著名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最年轻，人均 GDP 最落后。粤港澳大湾区内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商事环境和监管体制的差异明显，行政壁垒较多，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障碍，其建设与发展还存在若干挑战（王旭阳&黄征学，2017）。具体而言，1）城市间在交通规划一体

化、新兴产业错位发展、公共服务同城化等方面还面临着协调难题；2) 原始力不足，区域内整体创新合作程度不深，创新资源未能完全实现共建共享；3) 交通枢纽功能不强，跨界交通基础设施衔接不够通畅；4) 粤港澳大湾区还存在着港澳两个独立关税区以及内地关税区之下的广东省等三个相互独立的关税区，税制管理存在不小的制度壁垒等（张燕，2017；张锐，2017）。

此外，国际知名湾区经济都是以一个中心城市而命名，但粤港澳大湾区并未突出某一个城市，因此，香港、广州与深圳谁将成为湾区龙头就格外令人关注。三地虽均有长项，但都未形成压倒性优势。香港乃国际金融中心，知名度很高，但其领导力却在下降；广州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不错，但在经济影响力特别是金融与高科技两个关键指标上失分不小；深圳的科技创新可拔得头筹，但在政治、科教、文化与历史影响力上与穗港不可同语（张锐，2017）。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发展需要“9+2（九座广东城市加两个特别行政区）”城市之间互相协同，实现优势互补。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既要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带动整个湾区发展，也要依托大湾区优势，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深化改革，建设成为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示范引领区。

参考文献：

[1] 蔡双立,张元萍. 基于资本市场多层次框架下 OTC 市场的构建:美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04):35-41.

[2] 戴春晨. 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对外开放的“试验田”[N].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7-03-17(004).

[3] 何诚颖,张立超. 国际湾区经济建设的主要经验借鉴及横向比较[J]. 特区经济,2017(09):10-13.

[4] 马忠新. 我国湾区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比较研究[D]. 深圳大学,2017.

[5] 申明浩,杨永聪. 国际湾区实践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J]. 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7(07):9-13.

[6] 王旭阳,黄征学. 湾区发展:全球经验及对我国的建议[J]. 经济研究参考,2017(24):5-10+36.

[7] 伍凤兰,陶一桃,申勇. 湾区经济演进的动力机制研究——国际

案例与启示[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32(23):31-35.

[8] 张锐. 湾区经济:国际步伐与中国格调[J]. 对外经贸实务,2017(05):93-96.

[9] 张晓兰,朱秋. 东京都市圈演化与发展机制研究[J]. 现代日本经济,2013(02):66-72.

[10] 张燕. “粤港澳大湾区”,即将崛起的世界级城市群[J]. 中国经济周刊,2017(11):39-41.

作者简介：

牛梦琦，现任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016 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现代管理科学》等期刊。

张思思，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导、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在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Demograph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等国际一流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曾任美国 IMPAQ 国际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城市研究院研究员、美国房利美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2009 年获得美国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欢迎媒体摘发、转载或采访。

媒体热线：徐梦瑶 联系电话：020-85222102

主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

电子邮箱：iesr@jnu.edu.cn

官方网站：<https://iesr.jnu.edu.c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

电话：020-85221755



黄埔大道西观点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